



徜徉植物园
◎ 冯周鼎

“整”歌曲

◎ 李新雨

在一个半小时车程的大巴上,闲来无事,无法做别的,便在手机上下载了一个歌曲生成软件,选了几首这几年写的歌词,复制粘贴,“喂”到软件里,几分钟时间,就做成了电子歌曲。

配器、旋律和演唱一应俱全。速度之快,令人震惊,不管哪首歌,完成时间最长没超过五分钟。如果网速再好点,完成速度还要快。真是音乐界的又一版速度与激情。

试听,个别字词有粤语或戏剧腔发音。《烟雨江南》《大美启东》《长江绿洲》,开头几首虽然歌词与音乐完全不搭,但毕竟做出了尝试,相当于在手机上体验了一把生活。

但这种“两张皮”的人机合作模式,就像一对需求各异的夫妻,一个肚子饿想吃饭,另一个情绪亢奋想跳舞,情绪完全不一致,怎么听都不协调,怎么揉捏,都揉捏不到一块儿。三个字:两张皮。

我的歌词是深情的表白,它合成曲唱出来,却是摇滚女孩的伤痛独白。美好的期待像安全玻璃受到强烈撞击,玻璃碴掉了一地。有几首经反复“喂”反复产生新歌曲,一首更比一首不堪,一次更比一次令人绝望。

直到我把一首七律改成歌词,合作效果才得到改善。因每句的字数大致相同,节奏好把握,那程序也似乎变聪明了。不过我要的是古风,那首歌怎么听都是流行歌。

接着又连续改了几首七律“喂”进去,十首所谓成品里倒总还有那么一两首中听的。

是七律成全了软件,还是软件让七律换个马甲继续在江湖上吃香喝辣?一言难尽。

依我的亲身经历,我感觉在目前情况下,利用程序搞出来的音乐总体上是赶不上人类创作的,因为没有“人”味,没有“情”味,也就没有“人情”味。但由于在几分钟之内,同一歌词可以制成多首风格和旋律完全不同的歌,作曲家完全可据此进行加工提升,依据电脑整出来的歌曲毛坯的提示,加上作曲者的才华和智慧,说不定真能搞出好听的歌曲来。

在这个智能软件纵横出没的时代,我想我们这一代人也许还可凭自己的才华和勤奋继续存活几十年。至于下一代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和空间,我不是算命先生,你也不是神仙,未来的事情让未来的人去处理、去解决。

在尝试用AI进行歌曲合成之前,我曾尝试用过AI程序进行短文制造。绝不是偷懒或幻想依赖软件一天制造八百篇文字赚钱。哪怕这些软件再先进,我

相信任何一个真正把创作当成人生享受的人,都不会俯首于这些软件的裙裾之下。我之所以主动体验,是因为网上就AI文字制造谈得如此热闹,作为一个写作者不能漠然视之、一点不了解,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。由于没有制造出一篇令人满意的文字,我前后下载过三四种功能类似的软件不停尝试。这些软件多半都要注册会员才能使用,为此,我花了好几百元钱。

尝试的结果,是这些钱都白花了:用这些软件制造心得体会之类的文章,功能特别强大,一二三四五,甲乙丙丁,条理清晰,逻辑严密,但在制造写景抒情文字的时候形同菜鸟,篇篇都有相同的起承转合,辞藻华丽、内容空洞,无病呻吟、华而不实。

这些文字属于小学高分作文、初一低分作文,初二以上的学生不能用。

也许在不久的将来AI写作功能会更加强大,但它也不一定能取代人工创作。在WPS office中有一项AI创作查证功能,但凡用AI制造出来的文字,都能清清楚楚被查证到。偷懒而又想写作,想让AI写作的文字轻松见诸报刊,看来这条路走不通。这个功能让现代科技为文学留下了最后一丝尊严。

不过这种尊严能维持多久,谁说得清楚呢。

之所以所有AI写作都只能叫制造,而不能叫创作,是因为截至目前所有电子脑壳都“创”不起来。也就是所有科研人员都必须遵守一条底线:让所有人工智能都不能具有人类那样主动思维的能力,以确保人类的安全。

AI制造出的文字,可以用“堆”做量词,用“篇”都算言过其实。因此,像我这样用自己的歌词去“套”歌曲的行为,不能用“写”这么文雅的动词,只能用粗暴的“整”,整歌曲,或说是整一首电子歌曲。跟整人、整顿、整治、整事情等用“整”组成的词的感情色彩相类似。

我不敢说AI什么时候能代替作家和作曲家,但在我有生之年,作为人类特有的脑力式创作,仍然具有电脑软件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价值。因为作为人类,我们拥有人的情感、人的情绪、人的复杂和多元。我们在努力追求完美,但我们从来不可能像精密的计算那么完美,我们那些不能尽善尽美表达的缺憾,恰恰是我们作为人应该具有的特征。正是这些,使人类创作出的文字具有独一无二的独创性、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。

如果有一天软件已兼具人类的情感和主动思考的能力,那么这些创造发明,多半已不再属于人类。

玉兰
一瓣

学界长者 载德永芳

——忆恩师邵大箴先生

◎ 沈启鹏



在我六十多年的从艺生涯中,曾得到许许多多老师的指教,除了技艺的传授外,还有文艺理论的点拨。曾聆听过文艺理论家王朝闻的演讲、美术史教授薄松年的授课、李松先生的书信教诲。更有邵大箴、薛永年、马鸿增、刘曦林、尚辉等诸多美术评论家对我画展的赏析评说、指点迷津。其中,中国美协美术理论委员会主任邵大箴和副主任马鸿增对我帮助最多,令我感激不尽,和他们相识真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缘分。

2000年10月3日,第六届中国艺术节在常州举行,在丁观加先生的引见下,我与邵大箴老师初次相识。邵老师为人谦和诚恳,丝毫没有一点“大学者”的架势。他任中央美院博导,先后担任《美术》《美术研究》《世界美术》三个重要学术期刊的主编,业务繁忙。我到北京参加一些学术活动或去美术馆观展,偶尔也能与他见上一面。后来在无锡江阴“文化创意产业高峰论坛”上,聆听到邵老师与薛永年、孙克、马鸿增、王鲁湘关于文化产业的三场精彩对话。会外,邵老师单独与我谈到画家自存代表作的归属问题,颇得教益。

2008年11月1日,邵老师应邀来南通作学术讲座并举办个展。他的山水画虽尺幅不大,但散淡清润、空灵雅致、无拘无束、返璞归真,可谓厚积薄发,流露真性情,这正是他“全真”和“自在”两方闲章之意蕴所在。学术报告会上,他宽阔的学术视野、辩证的学术态度,使听者对全球化背景下现当代美术走向有了一个明晰的思路。外地画家宋雨桂、丁观加、高云、余丁、刘二刚、杨春华等都专程赶来,这对南通美术界来说更是机会难得。那次,不知天高地厚的我,竟出示自己刚编撰的书稿《时代印记——启鹏年画连环画宣传画创作回望》祈求指教,想不到邵老师十分乐意为这本小册子作序,并于当月打印交给我。序文在肯定我早期致力于“大众美术”所做出的努力和成果的同时,以一位美术史论家的学术视野,对那个年代艺术观念的局限性作出思考,同时指出我今后的努力方向。邵老师与靳尚宜、詹建俊并称中央美院“三巨头”,我无缘进南艺,更没敢考中央美院研究生,却一样得到博导的指点,真是太难得了!

我在北京举办的两次个人画展,均得到邵老师的鼎力相助。2007年11月24日,我在中国美术馆举办“时代心象——沈启鹏中国人物画文献展”,同时举行学术研讨会,邵老师列出评论家名单,亲自主持研讨会。那天,在中国美术馆开幕的五个画展都将进行学术研讨,有的评论家被同时邀请,邵老师和袁运甫、薛永年、李树声、夏硕琦、孙克、赵力忠、李松、刘龙庭、尚辉、陈履生、李一等十八位评论家,上午半天专为我的画展认真研讨,令我大为感动。老师们对我的从艺历程、艺术个性、与时代的关系及今后努力方向等均作出中肯而深入的分析,尤以“不知疲倦的时代歌者”“主题创作的活化石”“没有上过大学却当上大学教授、副校长,当为共和国美术史上的个案”“有理想有社会责任感的美术家”等评说,令我潸然落泪,邵老师的指导帮助,我铭记在心。

时隔十年,2016年5月,中国国家博物馆邀请我举办“时代心象——沈启鹏绘画六十年回眸”作品展。为配合南通电视台制作专题片,邵老师接受访谈,他对我的艺术人生作了中肯而积极的评价,特别用了“勤奋”“执着”“工匠精神”给予褒奖。5月17日开幕那天,83岁的邵老师从望京赶来,令我感动。在展厅里,他不仅勉励我,还与南通来的领导嘉宾交流、合影。没想到的是,一个月后画展结束,他主动关心画展及收藏相关事宜,与国博吕章申馆长磋商协调,如长辈关心后生、师长厚爱学子一般体贴入微,令我深深感动。我想,这是出于一位著名的美术史论家崇高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,也是出于对一名后辈学人真诚的关爱之心。

2021年11月,中国美术馆举办学术邀请系列展:“文心墨韵——邵大箴艺术展”,以大量珍贵文献资料和书画作品全面回顾他的艺术人生。整理并展出反映邵先生在介绍西方艺术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、构建当代美术评论和教书育人四个方面的丰硕成果。我虽无法赴京目睹,却从诸多媒体中学习体会,倍感亲切。

我是七年前与邵老师建立微信联系的,逢年过节都互致问候,他一直关注着我的艺事,还关心我夫人的健康。我也一直默默祈祷邵老师及其夫人奚老师平安幸福。6月11日,我给邵老师寄去刚出版的新书《活水源头》以祈教正,未见回复,微信请安也无音信。没想到7月25日上午11时晴天惊雷,邵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!

我敬重的邵大箴恩师,安息吧!我将永远缅怀您!